

新中国赴匈牙利汉语教学第一位中国教师郭预衡往事访谈录*

黎 敏

摘 要：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是伴随现代汉语规范化运动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由此产生的对外规范现代汉语教学，也伴随着新中国的外派汉语教师走出国门。郭预衡教授是中国政府派往匈牙利的第一位汉语教师，其夫人赵淑华老师随之赴任。他们共同努力，将中国传统优秀国学和现代汉语教学成果带到匈牙利高校的教学中，为匈牙利传统汉学培养了新型人才，也跟匈牙利同行一起拓宽了汉学研究空间。本文以访谈的方式回顾这段历史，以期有助于国内学界增加对当时中国与匈牙利学术交流的了解，增加对1950年代匈牙利高校汉语教学新探索的认识。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 匈牙利高校 汉学教学 新一代汉学家

【访谈者按】在新中国汉语教学走出去的历程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郭预衡先生是由中国教育部委派的第一任赴匈中国教师。1955年至1957年，他任教于匈牙利罗兰大学东亚系的中文专业。1956年，郭预衡先生的夫人、北京大学赵淑华老师赴匈随任，也在该校中文专业教授汉语。2020年8月28日下午和11月8日下午，我先后两次对赵淑华教授进行了访谈，目的是通过郭预衡先生夫妇在匈牙利执教的经历，从个体实践与观察视角了解那段珍贵的历史，丰富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后，在复杂国际关系背景下展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认识。

* 本文为世界汉语教育协会2021年全球中文教育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中匈建交后匈牙利汉语教学史研究”（项目编号：SH21Y07）的阶段性成果。

【郭预衡教授简介】郭预衡教授（1920—2010）1941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1945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著名文史专家、目录学大师余嘉锡先生的助手。不久，他考上了精于史源考据之学的校长陈垣先生的研究生。1949年，郭预衡开始在辅仁大学任教；1950年任讲师。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他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55年，他被派往匈牙利讲学。1957年，郭预衡从匈牙利回到北师大中文系继续在古典文学教研室工作，直到1990年离休。其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所撰写的《中国散文史》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他还率弟子历时12年完成14册约600余万字系列教材，包括《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1999年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荣获华东地区古籍评奖特等奖，同年被教育部高教司重点推荐为全国通用教材。

【赵淑华教授简介】本文中的被访谈人赵淑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52年入“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该专修班并入北京大学，更名为“北京大学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赵淑华也随之调入北京大学，教授留学生汉语。1956年至1957年她跟随丈夫郭预衡教授赴匈牙利罗兰大学任教；1980年和1981年两次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暑期班任教；1985年至1987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任教；1993年及1995年至199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她参加过一些富有影响力的教材编写，如《汉语教科书》（1958）、《基础汉语》（1971）、《汉语读本》（1972）、《基础汉语课本》（1980）等。

黎敏：赵老师，您好！在拜访您之前，我读了这本《对外汉语教学名师访谈录·赵淑华卷》（以下简称“访谈录”）^①，从中了解到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些情况，比如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开始于1950年成立的“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以下简称“清华专修

① 崔希亮主编：《对外汉语教学名师访谈录·赵淑华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年。

班”)，1952年您被调入这个专修班任教，从此开始了您的对外汉语教学生涯，一直到1994年退休。您经历了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在教学理论、教材、师资等方面从起步到逐步发展，再到繁荣兴旺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在国内展开的对外汉语教学以外，已经开始致力于海外汉语推广工作，受当时外交政策影响，新中国派往海外执教的汉语教师最早是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比如1952年，朱德熙先生受中国政府派遣到保加利亚教授汉语；1955年，郭预衡先生由中国政府派往匈牙利执教，您在1956年随任，跟郭先生一起在匈牙利罗兰大学教汉语，你们是新中国第一批“走出去”教汉语的教师。所以我想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当时郭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教师，那时他多大年纪呢？

赵淑华：大概是34岁吧。当时咱们派出的教师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岁，年富力强，好像朱德熙先生去保加利亚任教的时候也是30多岁。

黎敏：那有什么派出条件呢？

赵淑华：具体条件我不清楚。

黎敏：当时外派教师赴任之前有没有相应的培训？

赵淑华：那时好像没有。也许听过几次报告，讲讲外事纪律什么的。

黎敏：当时对派出教师在业务上要做哪些准备，有具体要求吗？

赵淑华：我没听郭先生谈过有什么具体要求。不过他去匈牙利之前，我陪他一起去拜访过吕叔湘先生。我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吕先生是我的老师。他送给了我们一本《语法讲话》的单行本。^①如果需要讲汉语语法知识的话，这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黎敏：郭先生到了罗兰大学东亚系后，他的教学是怎么安排的呢？

赵淑华：郭先生开始只教一个班的中文课。后来，东亚系了解到

① 从1952年7月到1953年11月，《语法讲话》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在《中国语文》上连续发表十七次。1961年参考《语法讲话》发表后读者所提的意见进行了全面修订，增加了“构词法”一章，以《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之书名出版单行本。著者署名为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

他的专长是研究古典文学，就让他也辅导系里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文献等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研究生的课没有固定教材，是按问题讲，就是郭先生根据学生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给他们讲课或者组织讨论，有时为了学生方便，也印一些讲义发给学生。

黎敏：您是什么时候到罗兰大学去的呢？到了之后也很快开始教汉语了吗？

赵淑华：1956年暑假，郭先生回国休假结束后，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匈牙利。我们大概是8月下旬到的。罗兰大学东亚系了解到我在国内教留学生汉语的情况以后，就请我在东亚系担任新开的一年级班的中文课，按讲师的待遇。所以，我不属于两国文化交流协定派出的教师。

黎敏：您在那里用什么教材呢？跟郭先生之间在教学方面有什么样的分工？

赵淑华：我用的就是郭先生编的教材。我去之后，郭先生原来教的那个班升入二年级，还由郭先生教。不过，他要用更多的时间辅导研究生的专业课。我就教一年级本科新生的汉语课。

黎敏：当时罗兰大学中文专业教研室主任是陈国先生（Csongor Barnabás, 1923—2018）^①，那时他很年轻，还是讲师。他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是匈牙利中文专业的黄金时代，虽然正式学生不多，但旁听生多达三十多人。^②我想这些人中有不少参加过跟郭先生的研讨吧！

赵淑华：是这样的。

黎敏：我看过的材料里说，郭先生1945年从辅仁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余嘉锡先生的助手。不久，他又考上了陈垣先生的研究生。余先生是著名文史专家、目录学大师，那时他正在修改、补充《四库提要辨证》的子部和集部，所以郭先生跟着他一一涉猎子部、集部各种书，还

① 陈国（Csongor Barnabás），匈牙利著名汉学家，1950—1962年在匈牙利罗兰大学东亚系任讲师；1963—1983年担任东亚系主任。从事语音史、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翻译，曾翻译《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名著。

② 余泽民：《译不完的〈金瓶梅〉》，《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97期，第81页。

替他查类书，校《世说新语》。陈垣先生精于史源考据之学，他给研究生开的课程之一是《史源学实习》，要求研究生一字一句地读顾炎武的《日知录》，然后校勘、写笔记，并从中找出错误，写成短文。^①所以，在两位高师的指导下，郭先生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古代文献功底扎实。

赵淑华：他这方面学得是比较早。1952年院系调整，郭先生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以后，中文系准备让郭先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他为此又阅读了不少现代作家的作品以及相关的研究著作。因此对现代文学也有一些了解。

黎敏：王宁先生说她在北师大读本科的时候，知道郭先生的名字就是因为郭先生研究鲁迅的两篇文章。王宁先生还赞叹说能够在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学这两个跨度很大的学科治学，“说明郭先生的学术能力是一流的，识见也是一流的”。^②郭先生的这些学术积累在匈牙利的教学中是怎样发挥的呢？

赵淑华：我想就是大家觉得可以和他谈的知识范围比较广，所以高年级学生，研究生，还有陈国讲师都愿意跟他一起学习。这样，他就要对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汉语语言教学两个方面都得顾及。我去以后分担了他的一部分工作，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辅导那些研究生，跟他们讨论古典文学或者古代文献方面的问题了。

黎敏：他们用什么语言讨论呢？

赵淑华：用汉语，有时也用英语。

黎敏：郭先生的英语很好啊！

赵淑华：郭先生英语还可以。他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辅仁大学读的。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那时的大学硕士研究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郭先生选读了英语和日语。他们学校也有很多外籍教授，需要用英语交流。所以，虽然他是中文系的，但是英语还可以。匈牙利学生也会英语。

① 尚学峰：《文学史家郭预衡》，《励耘学刊（文学卷）》2011年第1期，第224—225页。

② 王宁：《郭预衡先生的幸运与不幸》，《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0期，第119—120页。

黎敏：这样看来，当时派郭先生去罗兰大学非常合适，因为匈牙利罗兰大学是东欧几个国家中汉学基础最雄厚的大学之一。从1924年起，当时的Pazmany Peter大学，也就是现在的罗兰大学就有了东亚系，后来东亚系开设了中文和日文两个专业。但是对中国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是古代，教授们可以看《论语》《孟子》《史记》等这些古代文献，但是不说汉语。这也是传统西欧汉学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兰大学东亚系中文教研室的研究与教学还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当时匈牙利著名汉学家李盖特（Lajos Ligeti, 1902—1987）^①教授任罗兰大学东亚系远东教研室主任，也是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和副院长。他对东亚语言很有研究，研究蒙学、满学和藏学。你们跟他有交往吗？

赵淑华：李盖特教授到系里的时候就会见到我们。他跟郭先生常用英语交谈，主要是谈学术方面的问题。有一次郭先生问我：“李盖特教授是汉学家，我跟他用英语谈话是不是不礼貌？还是应该用汉语谈比较好呢？”我以前听说过有的汉学家对某一方面的专业很有研究，但并不一定注重口语，我就说：“他如果跟你用英语谈，你就也用英语；他如果用汉语你就也说汉语。要是他说英语，你却一定要说汉语，反而是对他的不尊重。”在系里，李盖特先生是老教授，又最有学问，是著名的汉学家，所以我们很尊重他。大家都非常客气。

黎敏：郭先生在汉语、日语、英语方面都有优势，而且他的学术积累对东亚系的汉学研究也非常有帮助。像您刚才提到的陈国先生后来就成了有名的汉学家，他是匈牙利教育史上第一位中文专业的学生，当时他是东亚系的讲师，你们跟他的交往多吗？

赵淑华：陈国先生当时除了自己的工作以外，还要负责照顾我们，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都靠他帮助。郭先生给高年级学生上课的时候，

^① 李盖特是匈牙利著名汉学家，是罗兰大学第一位开设蒙古语和西藏语言文化课程，讲授中亚史的学者。1947年起任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并任匈牙利科学院副院长长达20年。1962年以前任罗兰大学东亚系远东教研室主任和《东方学报》总编，其研究领域广泛，包括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和文献、汉学和汉语史等。

有时他也去听，所以他们有很多专业方面的交流。我们是第一批派到匈牙利的汉语教师，他肯定觉得什么都很新鲜。我们一般早上八点多去上课，下午也会在办公室备课看书，往往会到四五点钟才回宾馆。陈国先生每天都来系里，所以我们整天都能在一起。那时候，他的口语提高很快。他也说我们去的这一年，他学到了好多东西。他是个诚恳热情的人，有时也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熟悉了以后，他就跟郭先生称兄道弟，管郭先生叫大哥，管我叫大嫂。我们在那儿工作非常愉快，不论是跟学生，还是跟陈国这样的同事，关系都特别和谐。他们挺照顾我们的，我们也都很满意。

黎敏：当时东亚系还有其他匈牙利的中文教师吗？

赵淑华：他们好像没有其他的中文教师，至少我没见过，只有陈国会中文。

黎敏：1952年秋，北京大学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一开始上课的时候，班上有翻译老师。在匈牙利教学的时候，有吗？

赵淑华：没有翻译老师，我去教，基本就是用直接法。有时实在讲不懂了，就用一两个英语单词。

黎敏：您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学过英语吗？

赵淑华：在大学我学了一年英语。后来号召大家都学俄语，我就又学了一年俄语。工作以后，我们的教材里都有俄文或英文注释，所以上课时不需要，也不主张用很多外语。

黎敏：我注意到您和郭先生在匈牙利执教期间，正赶上一个重大事件，就是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这个事件对你们当时的生活和教学有什么影响？您能谈谈您经历过的情况吗？

赵淑华：10月23日那天早晨，我起床后，从百叶窗向外面看了一下，发现大街上全是坦克，一辆辆大卡车上坐着一排排的士兵，也不知道这些车是什么时候开到这条街上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坦克和卡车一直停在那里，士兵们都整整齐齐一动不动地坐在车上。我们就给使馆打电话问情况，使馆说：“你们尽量不要出去，等使馆的通知。”

看来课也不能上了，街上已经戒严。第二天早上发现坦克和卡车都开走了。街上的人很少，公共交通也都停了。陈国先生打来电话，让我们暂时待在宾馆里，学校已经停课。又过了几天，郭先生有时候出去买点东西，街上的商店有的关门了，有的还开着，还能买到罐头、面包之类的食品。后来，使馆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要派车来接我们，告诉我们，离开宾馆时什么都不要拿，就好像平时出门的样子。所以我只能拿一个手提包，郭先生只能拿一个公文包。我就在我的手提包和风衣口袋里塞满了卡片，那些是我平时学习《马氏文通》做的。那时《马氏文通校注》在国内很难买到，我在东亚系图书室发现了这本书，这个图书室有不少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书。郭先生也在这里看到了鲁迅的全部著作。郭先生的公文包里装满了他做的读书笔记。

黎敏：这跟郭先生读书的习惯有关吧？我看过童庆炳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就谈到郭先生读书时习惯夹纸条，把扼要的字句或者心得体会都记在上面，但是一张读书卡片也不做。^①大概在匈牙利因为自己带去的书少，大部分是借来的书，所以不得不改变习惯，把读书心得记在笔记本上。

赵淑华：也许是吧。他回国的时候大概这样的笔记有七十多本。所以，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我们就尽力装着我们的这些“宝贝”，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拿，只多穿了一套内衣，就下了楼。一走到宾馆门口，就看见使馆的车已经停在那里了。到了使馆以后，我们就没有再出来，直到事情平息。这期间，使馆陆续把留学生也都接了过去。我们住在武官家里，留学生们都住在大厅里。使馆就是中国，我们心里踏实多了。那时，使馆外面不断有枪炮声，使馆楼高层的玻璃也有被流弹打碎的，但外边的情况谁都不了解，跟国内已经断了联系，接不到国内的指示，不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种事件。真难为当时的驻匈大使郝德青，我想他一定很焦急，但又得冷静地维护我们的安全。就这样，我们都吃住在使馆，也不能出去。使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每天冒

① 童庆炳、宋媛：《治学要讲究精神与方法——童庆炳先生与青年学者谈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49页。

着生命危险出去采购，那么多人住在使馆里，需要吃饭，所以他们得天天出去买东西。有一天，罗兰大学东亚系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带着枪到使馆来看郭先生，郭先生在使馆传达室见了。他说：“现在发生问题了，我有枪，可以保护你们。你们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郭先生不了解这个学生的背景，只能表示感谢，告诉他等事件过去以后，我们还会去上课。

大概过了两三个月，事件完全平息，我们也不需要住在使馆了。不过，我们原来在布达那边住的宾馆有一部分被炮火毁坏了，我们住的那个房间的一面墙被炮弹打穿了。所以这个宾馆不能再住了，需要给我们安排新的住处。我们向东亚系提出希望住在佩斯这边的多瑙宾馆，这个宾馆离学校比较近，去使馆也方便。但好像多瑙宾馆不属于匈牙利教育部管，就是说不是大学安排住处的范围，可能它主要是接待外交、商贸方面的人员的。所以大学得为此专门去联系。后来，陈国说匈牙利教育部同意我们住在那儿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挺照顾我们的，住这个宾馆对他们来说可能要麻烦些。

黎敏：复课以后，教学上有变化吗？

赵淑华：事件平息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上课了。教学按原计划进行，只是进度加快了，我们想尽量把失去的时间多补回来一些。学生们情绪比较稳定，学习也更加努力，他们也希望多学一些，学得快一些，很配合我们的安排。不过，有的学生离开了匈牙利，郭老师班里有叫彼得的学生就去国外了。

黎敏：您还能记得当时学生的名字。

赵淑华：有几个记得。郭先生班里有叫亦娃的，后来她到北京大学学习过。1994年到1999年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这期间她去日本开会，往返路过中国，曾两次来看郭先生。可惜我不在北京，没能见到她。我班里有个女生，按照音译，我给她取的中文名字是“伊利蒂可”。她的匈文名字是Ildikó，“kó”很难找个适合女孩子的汉字，所以我就用了“可”。她有点残疾，每天坐着轮椅来上课，她的语音很

好，清晰、正确。听说她后来曾在一个博物馆工作，也许能用上中文。

黎敏：她后来取了汉语名字叫艾之迪（EcsedyIldikó，1938—2004），并且成了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是匈牙利语言学研究所东方学委员会顾问，罗兰大学中文系教授，1994年被选为罗马欧洲科学院院士，是陈国先生最佩服的两个弟子之一。另一位是杜克义博士（Tökei Ferenc，1930—2000）。1957年杜克义博士初译的《诗经》在匈牙利出版，这本译作中就有郭先生的贡献，他大概对其中的插图提了不少建议。这本书出了2000册，在匈牙利被抢购一空。所以，当时郭先生对陈国、杜克义这些汉学家很有影响，他的专业水平也得到陈国先生的一再肯定。2014年，中匈建交65周年的时候，他们出了一本书，陈国先生在那本书里提到郭先生和您。他说：“1955年，在匈牙利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协定范围内，郭预衡开始在大学中文系担任下一个中文老师，他的文化水平远远高于一个普通语言教师，原来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史的副教授，他用汉语讲课，我们不断向他咨询古典文献的问题，他的工作大量提高了我本人和我们高年级学生中国古典文献学和语言学的知识，为我们后来发表的翻译作品打下了基础。”他对您的工作是这样评价的：“半年以后，他的妻子赵淑华也来到了布达佩斯，她是专业的语言老师，熟练于留学生的中文教育，在国内当过越南学生的中文老师，在我们这里也很成功地教授口语。”^①

赵淑华：感谢他！他好吗？现在怎么样？

黎敏：他2018年过世了。

赵淑华：哦，没想到。至今也快三年了。很想念他！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黎敏：不过到现在在匈牙利还有记得您和郭先生的人呢。

赵淑华：谁呢？

黎敏：尤山度（Józsa Sándor）先生。

① [匈]陈国：《我最早遇到的中国人》，匈中友好协会编：《北京的匈牙利狂想曲》，内部印刷，2014年，第10—11页。

赵淑华：我知道他，他在清华专修班留过学的。我们在匈牙利见到他时，他已经是外交官了。

黎敏：是的，他是1950年第一批来中国留学的匈牙利交换生，1955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匈牙利外交部工作。我在访谈他的时候，他就说过郭预衡先生是科学家，是非常棒的老师，中国文学修养非常高。他还保留着郭先生的手稿。他也认为您是非常好的教外国人汉语的老师。^①

赵淑华：那时候，他经常去罗兰大学，所以我也见过他很多次。他到系里去办什么事，或者找什么人，或者找郭先生探讨什么学术问题，跟郭先生就已经挺熟的了。

黎敏：他后来也成了匈牙利著名的汉学家，写了《中国与奥匈帝国关系史》等专著以及几十篇介绍、研究中国的文章，他还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诗词21首》、艾芜的《山野》、茅盾的《春蚕》、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看得出来，当时郭先生跟匈牙利的汉学界交往比较多，给他们的印象也非常深。您有当时您和郭先生在那里执教时的照片吗？

赵淑华：没有。我们一直没有照相机。本想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买一个，但后来发生了“十月事件”，商店都不开门了，再后来又缺货了。我倒是有一张去匈牙利之前的照片（赵老师找到那张照片给我看）。这张照片是因为我们要去任教，所以匈牙利驻华使馆请我们吃午餐，教育部派车，由一位司长带我们去赴宴。吃完饭，我们去照了这张照片。

黎敏：郭先生是中匈建交后，中国教育部委派的第一任赴匈牙利教授汉语的教师，也是中匈交往史上第一位由中国政府派往匈牙利的汉语教师，意义不凡，所以中匈双方都很重视。这是一个开端，通过你们的工作，为中匈文化教育交流打下了基础。比如郭先生的教学让

^① 访谈材料。被访谈人：尤山度；访谈时间：2017年3月2日；访谈地点：布达佩斯尤山度宅；访谈人：黎敏。



图8 郭预衡、赵淑华赴匈牙利执教前照片，
由赵淑华教授提供

当时的匈牙利学生在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献、现代文学等方面受益不浅。我看您在那本“访谈录”里说匈方对你们的工作很满意，向中国使馆提出让你们延任两年，大使也同意。但是，因为郭先生想回国从事专业工作，所以没有继续留任。^①说明你们在那里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赵淑华：当时他们希望我们继续留在那里教书，但是郭先生希望回北师大搞他的专业，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回来了。

黎敏：陈国先生也对郭先生记忆深刻，记了一辈子，在他晚年接受别人的访谈和写文章时都多次提到郭先生，对他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因为郭先生被派到匈牙利执教，新中国也跟匈牙利的汉学界有了初步的接触。匈牙利汉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向更广泛的领域拓展，对近现代中国的介绍、研究成为一种新的取向，这种变化原因复杂，但其中郭先生通过对他们的教学以及跟他们探讨，一定对他们产生了影响，所以他们记忆深刻。您虽然不是教育部委派的，但是您是第一位在匈牙利执教的专业对外汉语教师。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

① 崔希亮主编：《对外汉语教学名师访谈录·赵淑华卷》，第5页。

争》的社论，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您在“访谈录”中也谈到，当时差不多人人都在学语法。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也是伴随着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化、系统化而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先生和您是第一批将规范的现代汉语教学带到匈牙利的中国教师。在你们之后，1957年，从中国留学归来的尤山度、高恩德（GallaEndre）回到罗兰大学，他们在中文系开设了现代汉语，成为第一代本土汉语教师；他们还开设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并从事这些方面的研究、翻译。所以，你们在那里的工作情况不仅对那里的汉语教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而且对匈牙利汉学的发展、中匈交流史都具有一定的意义。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